

【内部文件，严禁传播】



课程报告

课程主题：“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授课专家：赵冬梅

授课时间：2023年8月25日



目 录

CONTENTS

平台介绍	/ 02
专家介绍	/ 04
现场直击	/ 05
课程金句	/ 07
课程大纲	/ 08
思维导图	/ 10
精品讲稿	/ 11



版权声明

课程报告属明德云内部学习文件
仅供VIP客户学习，请勿外传
内容仅代表专家观点
不代表明德云学堂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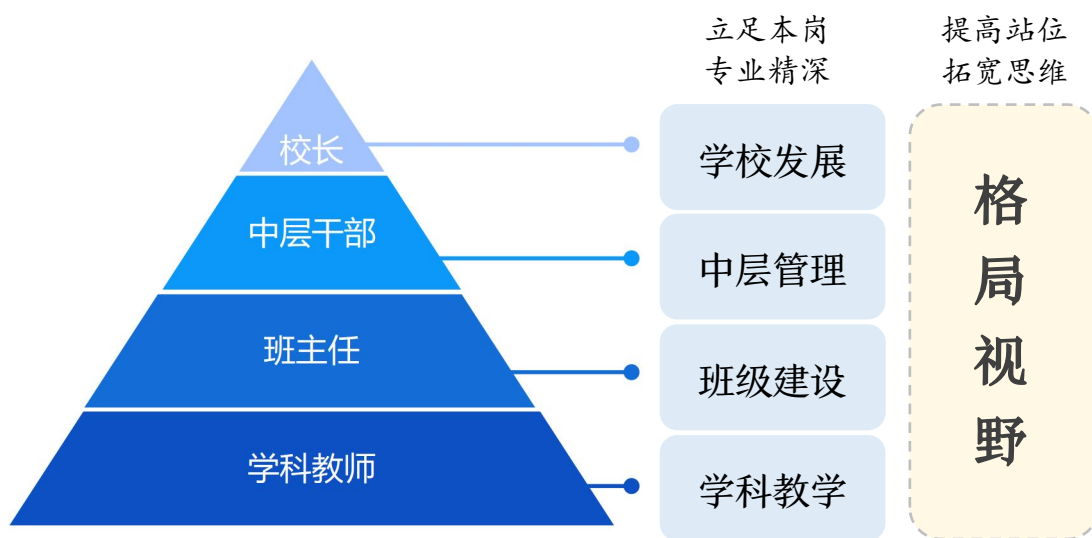
平台介绍

明德云学堂 教师专业成长智库

明德云以科技赋能教育，是教育数字化内容和平台提供商。

明德云学堂是明德云旗下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在线教育智库，聚焦前沿教育理念，秉承“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牌使命，通过系统的培训体系、高端的培训内容、精细的培训服务与在线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推出“个性选课，集中学习；线上内容，线下服务”的特色师训学堂，以面向未来的培训理念和方式，致力于打造优质前沿的线上教师培训平台与教师终身学习平台。

课程架构



双线发展：“专业精深”与“格局视野”双线学习路径，培养复合型教师人才

分层分类：构建分层分类系统化培养体系，加强专业纵深，助力全员持续成长

· 课程内容

明德云学堂抛弃浮躁的碎片式培训和短期式培训，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课程编排，以“线上直播，名家引领，分层学习，集中研讨”的教学模式，面向各会员校校长、管理干部、班主任及科任教师开设精品课程。

明德云学堂 2023-2024 年度直播课分为名家引领、名师示范和名校云访三大模块。其中，“名家引领”通识类课程共 88 节（包含明德云学堂 2022-2023 年度课程 50 节、明德云学堂 2023-2024 年度直播课 38 节）；“名师示范”即专业类课程，共 37 节（包含小学示范课 15 节、初中 13 节、高中 9 节）。

名家 引领	提升格局开阔视野	小学 9 科	最新示范课
	管理干部能力提升		评课解读
	班主任队伍建设		专题讲座
	教学教研能力提升	初中 13 科	学科教学实践
	青年教师培训		单元教学
	心理教育专题		作业设计
	教师职称评定	高中 9 科	复习策略
	家长教育		科学备考
	学生教育		高考志愿填报

名校 云访	校园文化线上参观	明德云将分别选择一所小学、中学及大学开展名校云访，带领学员在线深入全国知名学校参访学习，汲取名校经验、借鉴名校模式、形成名校视野。
	中小学办学特色	
	中小学线上听课、教研	
	大学专业介绍及学习生活	

专家介绍

赵冬梅

-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 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 ◇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
- ◇ 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 ◇ 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主要著作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



 明德云

**“华夏群星闪耀时”：
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赵冬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

会员年度课程
Annual Membership Course

现场直击





课程金句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历史学科是一个反思的学科。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待人接物应对事不对人,理性而有温度。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学习历史学科要提高阅读能力,学会反思性阅读。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北宋创造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我们要挖掘传统文化当中可以与现代性接轨的内容。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历史需要通过一种通俗易懂的友好方式抵达年轻一代。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学习传统文化时,我既要尊重文本本身,又要学会区分。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宋代知识分子对官僚生涯的渴望不是升官,而是实现理想。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课程金句

不加区分地让孩子学习传统时期的童蒙读物是有问题的。

课程大纲

一、引入部分

(一) 华夏政治文明，造极于赵宋之世

(二) 千古风流人物——北宋士大夫

1. “士大夫”的核心与主流是科举出身的新型官僚
2. 北宋士大夫创造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二、士大夫政治

(一) 士大夫特点

1. 儒学修养
2. 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
3. 家国情怀，孝子忠臣
4. 大忠之义，道统自觉
5. 实干精神

(二) 士大夫“事上”

1. 对事不对人
2. 理性有温度，

(三) 士大夫“遇人”

1. 忧民之忧，以“不扰”为善政
2. 不媚上，不从俗，实事求是

三、“最好成绩”形成的背后因素

（一）政治传统

1. 宽容：“太祖誓碑”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
2. 多元：允许不同政治意见存在
3. 思想最为自由
4. “祖宗法度惠民”，不夺农时

四、两大改革

（一）庆历新政

1. 失败原因
2. 经验教训

（二）王安石变法

1. 变法成功
2. 造成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思维导图



精品讲稿

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华夏群星闪耀时——漫谈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其实从这个题目当中，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借用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我认为宋代就是一个“华夏群星闪耀时”，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宋代和宋代的士大夫政治。

这是一张辽北宋时期的全图，北宋的领土如果跟历史上的汉唐比起来，事实上是非常小的。然后我们再看一张南宋时期的全图，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之内，南宋其实占很小的一块。随着南宋首都迁往南方，南宋和金之间的界限，其实就成了中国南北方的地理界限——秦岭、淮河一线。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跟历史上汉唐疆域相比较，它都是一个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



但是这样一个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它对于华夏文明的发展却有着跨越时间的深远影响力，这个我将其称为“小帝国的大风范”。关于宋代的小帝国的大风范，民国时期的大学者，比如说严复还有钱穆，其实都曾经有过很精彩的论

述。

严复先生在《致熊纯如》的信里说道：“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严复认为，古代人喜欢读前四史，因为文字好。但如果我们想研究中国人心政俗的演变，那么就需要关注赵宋一代。因为宋代发生了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塑造了后来中国的样子，一直到清末民国，这种样态都没有改变。

钱穆先生也说过：“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严复和钱穆这两位民国时期大学者，他们都表达了自己充满学术洞察力的主观判断。而他们的判断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认为在宋代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宋代所发生的这个变化塑造了后来中国的样貌。

但是现在我要请大家共同思考的就是，不管是严复还是钱穆，他们对于宋代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性质没有做价值评判。严复说“为善为恶姑不具论”，也就是说这些变化究竟是好是坏，先不去评判。而按照钱穆的说法，古今之变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宋代。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分水岭，宋代以前是古代中国，宋代以后是后代中国。但是宋代发生的变化究竟是好是坏，钱穆也没有做判断。

而与严复和钱穆不同，民国时期大学者陈寅恪先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陈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先生也同意宋代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塑造了后来中国的样子，塑造了后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但是陈先生的说法同严复、钱穆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陈先生认为在宋代发生的变化是积极的变化。先生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在赵宋之世抵达了巅峰期。宋朝是华夏文明的巅峰期，宋代文化的成就不

仅是空前的，而且还是绝后的。

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陈先生到南方避难，来到广西桂林，并住在雁山园红豆小馆。这段话是他为邓广铭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里的一段话。截止到1943年，陈先生认为宋代仍然是华夏文明的巅峰期，而且华夏民族文化仍然处在“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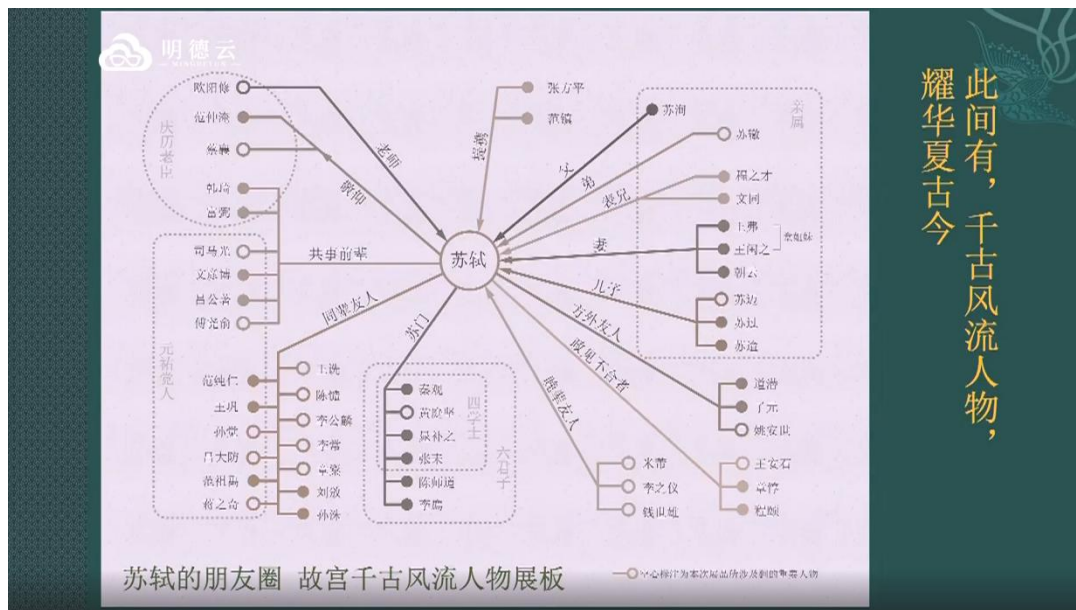
同严复、钱穆的判断相同，陈先生的这段话其实也是一个大学者充满学术洞察力的主观判断，他并没有展开有关宋代和其他时代的比较研究。不管是关于宋代的具体研究，还是宋代和其他时代的比较研究，并未展开。三位先生的观点其实都是基于他们自己读史的心得，他们读中国的历史，也初期研究西方的历史，他们立足在时代的潮流——中国刚刚开始迎接世界、融入现代，在世界文明之林中去寻求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着深厚的旧学的修养，同时也受到了西学的教育和西学的冲击。这些民国时期的大学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如此深厚影响力的大师，他们跟今天大多数学者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其实就是他们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以及他们的开创力。他们处在一个开创的时期——现代范式的学术研究正处在一个筚路蓝缕的时期。他们是开创者，也就意味着在他们身后，现代范式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事实上是方兴未艾的。因此我特别强调，刚才我引用的严复、钱穆、陈寅恪先生的话语，其实都是具有深刻学术洞察力的主观判断。他们开启了后来的研究，但在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研究尚未展开。

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广铭先生说过一段话。他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邓先生的话较之陈先生的话有继承性，邓先生和陈先生都承认宋代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期。但是邓先生跟陈先生不同的地方在哪里？陈先生认为，在整个华夏文明的发展史上，截止到1943年，宋代都是华夏民族之文化的巅峰期。而邓先生把这个时间节点，做了一个收缩。邓先生说这个时间段是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之内。邓先生所说的这个“封建历史时期”，其实大体上相当于后来学者所说的“帝制时期”，但是又不是完全的帝制时期，如果说完全的帝制时期，

那就截止到 1912 年年初了。邓先生说的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并且还有一个限定语，就是“截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时期”。

所以邓先生截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比陈先生是大大的收缩的。邓先生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 1943 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这 40 多年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在陈先生的时期，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但邓先生的《宋史职官志考证》其实就已经是现代范式的宋史研究，特别是对于职官制度梳理的奠基之作。

今年是 2023 年，我现在做这个讲座的时候，距离邓先生做这个判断已经过去了 40 多年。距离陈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时候，过去了整整 80 年。在过去这 80 年的宋史研究基础之上，如果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陈先生的说法。如果我们主要着眼于华夏的政治文明，那确实是“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并且“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此间有，千古风流人物，
耀华夏古今

我举一个并不是很严谨的理由。2020 年左右，故宫做过一个“千古风流人物展”。故宫的“千古风流人物展”其实是一个以苏轼为主题的展览，故宫的学者做了一张“苏轼朋友圈”的展板。在这个展板上我们能够看到欧阳修、范仲淹、蔡襄、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秦观、黄庭坚、李之仪、米芾、王安石、程颐。我想我们每读到一个名字的时候，各位校长、老师都会有会心的

地方。我常常开玩笑说，这些曾经共同呼吸过开封空气，曾经共同仰望过宋朝星空的这一群人，其实就构成了课本上的“北宋天团”。我们中学语文课本上的那些背诵课文，有很多都是来自“苏轼的朋友圈”。当然，苏轼是最核心人物。这些人物贡献了那些语文学习中需要背诵的文章，以及作为汉语言文学最宝贵的财产。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北宋的开封，确实是有照耀了华夏古今的千古风流人物。再过千年，如果人类文明还在，如果我们的汉字还在，那么汉字所承载的文明就在，人们就会记得苏轼。而且我相信随着中国文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改造以及现代性的创造，苏轼的故事、苏轼和他的朋友圈的故事会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苏轼的诗文，苏轼的遭遇，苏轼的精神不仅会照耀华夏的今天，也会照亮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生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想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论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儒家背景之下的政治文化，它的最高峰就是在宋代。

现在我再来问一个问题——这些千古风流人物，他们究竟是谁？

最简单的一个答案——他们是北宋的士大夫。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里曾经自问自答。他说：“宋朝的士大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是受过儒家经典及相关知识教育的无数个人，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士’。通过荐举或科举考试，他们成为文官集团中的终身成员或曰职业官僚。如此这般，他们构成统治阶级。”

他们是接受过儒家经典教育的官僚，他们既是有着深厚修养的儒家学者，同时他们又是帝制国家的职业官僚。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而他们加入统治集团，其实又改造了统治集团，创造了一种新的士大夫文化。

士大夫的核心就是科举出身的新型官僚。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会提到科举制度，而被当作科举制度标志的选官科目，通常我们认为是进士科。进士科是隋朝的时候才创造出来的，唐代也一直在实行科举考试，所以我们通常讲科举的开端

是隋朝。但是尽管从隋到唐，甚至在五代乱世之中，科举其实基本上是每年举行的。但是只有到了宋朝，科举出身的官员才成为文官的主流和正途。只有从此途上才能抵达那些重要的职位，而他们在文官当中的占比，特别是重要文官职位中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他们才真正改造并决定了官僚的文化。

北宋的蔡襄曾经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按照蔡襄的说法，到了北宋中期，这个国家所有重要的职位都是由文士来担任。宋代的文士到了蔡襄这个时候，是处在一个“包打天下”的状态之中。当然蔡襄这句话其实也有他的大的背景，蔡襄是觉得这样不行，他认为官僚队伍要专业化，不能全部都用文词写得好的。从蔡襄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群人的特点，其实他们是善于思考的，有批判精神的。

现代学者有一个统计，北宋宰相 71 个人，科举出身的占到了 92%，副宰相级的 153 个人，科举出身的占到了 91%。对于官场的影响和对于社会的影响来讲，宋代科举跟宋以前的科举，完全不是一码事了。

何怀宏先生在《人类科举》这篇文章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唐代虽行科举，但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极小，基本上还是一个贵胄社会。或如陈寅恪所言，是一个有赖于门第的旧贵族与借助于科举的新贵族并存及相争的社会。在两宋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宋代考试行糊名、誊录、锁院等，取士全然不问门第，士大夫多出草野，贵族就无论新旧而皆消亡，社会渐转成一个完全的科举社会了。”

不管是对于官僚集团的影响，还是对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唐宋科举都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唐代有科举，但唐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家族决定个人的时代，所以它是一个贵胄社会，或者说它处在一个变化期——科举新贵跟借助于门第的旧贵族并存相争，但是是科举出身的新贵族逐渐在上升的。到了宋朝，这个竞争关系就完全发生了逆转。贵族经过唐末，比如黄巢大起义和唐后期战争的洗涤，只残余社会文化的部分。在官僚文化与社会结构当中，这些贵族的影响就非常小了。

宋代科举出身的人，他们占据了官僚集团的核心和主流，宋代就完全转变成一个科举社会。这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他们是一群帝制国家的官僚集团统治集团当中的新人，这群新人创造了新政治和新的政治文化，这就是“华夏群星闪耀时”的本质——新人创造出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那么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是什么样的？士大夫政治的形态究竟呈现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首先来看苏轼在给欧阳修的《六一居士集》所写的序当中，苏轼的一个总结。他说这群人的特点是“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通经学古”可以理解为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到了范仲淹这个代际，宋朝士大夫都是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的，他们是儒臣。他们读书跟我们今天读书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读书其实是向外读书，通过学习知识改造外部世界，不管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同时我们读书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自己适应外部世界，要取得文凭，取得学历，然后找工作。

但是古人不一样，他们学习其实是向内的，他们要修身，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先向内再向外，是由内而外的，他们的“通经学古”其实是需要实践的。这群人是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的，当然他们的家国情怀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当中的——先为孝子，后为忠臣。

可是这群人的忠诚，其实跟唐代的忠诚很不一样。宋代士大夫强调“大忠之义”，“大忠”就是忠诚于江山社稷，而不是忠诚于皇帝个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社稷国家和皇帝个人其实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分界，而他们所忠诚的对象是江山社稷，是朝廷国家，而不是皇帝个人。由此我借用范仲淹的说法，称之为“大忠”。

“大忠”其实是一个宋代的儒家回向先秦的一个重要进步。因为有“大忠之义”，所以他们能够“以救时行道为贤”，秉持着道统的自觉，用真理来匡正时弊，匡正皇帝的错误。因此在面对皇帝的时候，他们能够“以犯颜纳说为忠”，

他们不是一个听从者，他们是独立思考的人，是能够直面现实的人，是能够提出解决方案的人，是当皇帝犯错误的时候能够坚持自己所认为的真理，不惜“犯颜”也要皇帝“纳说”的人，这就是大忠之义和道统自觉。

同时，宋代士大夫有实干精神，他们是非常能干的官僚。

刘子健先生说：“他们是文臣中的儒臣，守原则、重理想……宋代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价值观念集中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福利两大领域……对‘道’的最高追求始终要重于他对官僚生涯的渴望。他是官员，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之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关心国家政策、道德水准、精英行为、哲学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一言以蔽之，他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

下面我们来看士大夫政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按照我的代际分析，我把北宋的政治家分成五个代际，第一个代际就开国一代，第二个代际就是宋朝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也就是寇准的代际，第三个代际就是范仲淹的代际。“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这是南宋大如朱熹的总结。从我们今天看呢，其实就是宋朝士大夫真正以鲜明的形象登上了政治舞台，有了自己非常明确的存在，就是从范仲淹这个代际开始的，在此之前是成长期，到了范仲淹时期就已经形成。

接下来我们就以范仲淹为核心，但不局限于范仲淹，来讲一讲士大夫政治文化具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宋朝士大夫是有“大忠之义”的，他们“以道事君”，并且“从道不从君”。他们是把“道”和“君”是分开的，“君”并不能够跟“道”完全同一，“君”有的时候会背离“道”。那在这种情况下，秉有“大忠之义”的士大夫是从“道”的，而不是从“君”的。当然他们是忠诚的，所以他们会“以道事君”，目的就是要将“君”拉回到“道”的路线上来。而这个“大忠之义”是建筑在道统自觉的自尊自信的基础之上的。

欧阳修在《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总结范仲淹这一

生，说：“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

“事上”就是侍奉皇帝和上级，“遇人”就是对待人和事。范仲淹不管是对待上级、平级还是下级，对全凭着自信，全凭着自己心中的是非观，而不是利害。

“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范仲淹的这种精神来自于先秦，是宋儒对于先秦儒家、原始儒家精神的择善而从和发扬光大。林则徐有一句话就叫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利害必趋之”，也与这种精神类似。对于范仲淹而言，他认为对的事情，他都会尽力去做。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就是“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如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如果这件事情是由我负责，那我一定要尽力去做。成不成那我没有办法，即便是圣贤，也不能保证他做的每件事情都成功。既然如此，自己怎么能够苟且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其实你可以简单地说，这就是敬业。但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无论大小，都能以这样的精神来要求自己，那么何事不成？就算不成，你回过头的时候，你是无悔的。什么时候才会悔？就是做了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不对的事情，这应该是要悔的。但对的事情去做了，那其实成不成都是无悔的。“虽圣贤不能必，吾其苟哉”，这是范仲淹的信条。

我们先来看范仲淹的看“事上”。北宋士大夫在“事上”的表现是一种理性而有温度的表现，他们是讲原则的，是对事不对人的。以范仲淹为例，范仲淹作为一个鲜明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时候，是宋仁宗朝刘太后当政的时候。在刘太后大权独揽的时候，范仲淹是坚持他认为正确的东西，他反对皇帝拜太后，他要求还政于帝。当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太后临朝听政时，以至日大会前殿”，就是在冬至这一天要举行最高规格的大朝会，“上将率百官为寿”，即皇帝决定要率领百官当众公开的，在这个盛大的、高级别的典礼上跪拜皇太后，“有司已具”，即有关部门已经把礼仪制度都准备好了。

此时范仲淹上书反对，他反对的理由是“天子无北面，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范仲淹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天子无北面”。按照帝制

时期的政治伦理，最具笼罩性的制度就是皇帝制度，皇帝制度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皇帝地位的至高无上。皇帝是面南背北的，他不可以拜别人，哪怕是要向母亲行孝道。在宫中皇帝可以行孝道，但是到了外朝，皇帝就是皇帝，他至高无上，这是范仲淹的第一条理由。

第二条理由就是，如果这么做了，那么今上的做法就会成为未来皇帝的一个先例，由此就开了一个坏头，这个坏头就是“若人主以强母后”，这个坏头不能开。这是范仲淹所持的第二个理由。我们按照当时的政治文化来衡量，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他是在挟原则以抗强权。范仲淹敢于提出反对意见，并且他还上书请求还政于仁宗，这是范仲淹所表现出来的原则和理性。

但范仲淹所针对的是太后破坏原则的部分，他并不针对太后本人，等到刘太后死了，他又能够保全太后的德。刘太后跟仁宗就是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中的那一对“母子”。他们确实是假母子，但是宋朝绝无狸猫换太子之事。仁宗从生下来就被抱走，作为刘氏的亲生儿子被养大，到了刘太后死了之后，才有人跟仁宗说，他的生母另有其人。

真相被揭露出来之后，仁宗和过世的刘太后之间是会有缝隙产生的。此时“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时事，欲深治之”，一些小人揣度仁宗的意思，他们以为仁宗对已经过世的，作为他生母存在蒙蔽了他多年的养母会有猜忌，于是就去搜罗太后的黑料，欲深治之。但范仲淹却提出来：“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未见过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为什么范仲淹要维护太后？他要维护的是仁宗作为儿子的孝道，这是一层。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是，范仲淹要维护的是上层的稳定，这对于宋朝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太后一死，人们就去搜集太后的黑料，那会引起政治上的巨大的变动。在最高权力交接的时候，是很忌讳发生这种情况的。

当然仁宗也是一个很仁义的人，刘太后对于母子关系的处理也还是不错的，包括刘太后在之前的政治家吕一检的引导之下，对于仁宗生母遗容遗体的处理也

都是非常得体的。所以在范仲淹等人的劝说之下，仁宗并未深治之。

在癸酉元年的时候，仁宗下诏：“诏中外勿辄言皇太后垂帘日事”。对于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保证了政治上的稳定。范仲淹在太后大权在握的时候，他敢于反对太后的做法，敢于反对那些给太后拍马屁的做法，他维护的是原则。等到太后死了之后，有小人要乘机搜集太后的黑料时，范仲淹又能够提出“未见过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这就是范仲淹“事上”的态度。他理性而有温度，讲原则，他对事不对人，这是范仲淹的“事上”。北宋的华夏群星在“事上”的问题上，能够做到范仲淹这样的，其实绝不止他一例，我们以其为代表，不再多举。

接下来我们看“遇人”，这个“人”有时候又可以通“民”，即“遇民”。最大的“人”就是“民”，是老百姓，是相较于国家而言的社会。

北宋的政治家、朝廷是能忧民之忧，以“不扰”为善政的。宋真宗时期的宰相李沆，他是属于寇准那个代际的政治家，是第二代政治家。李沆做宰相的八字政治原则是论语当中的“节用爱民，使民以时”，意思是上层要节约用度，要爱惜民力，在制定政策、有项目要征发民力的时候，要“使民以时”，不破坏农时。在以农业经济为经济主体的帝国政府中，最重要的政策追求就是不扰民，要“使民以时”。

所以《石壕吏》当中的那一家子，三个儿子都被征发，就连老太太也随军“备晨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会下降，国家也会衰落。“以‘不扰’为善政”“节用爱民，使民以时”这是儒家的信条，也是让农业国家能够长治久安非常重要的政治原则。

我们再举一个王旦的例子。《宋史·王旦传》中记载：“薛奎为江、淮发运使，辞旦，旦无他语，但云：‘东南民力竭矣。’奎退而曰：‘真宰相之言也。’”薛奎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江淮发运使是干什么的？就是把东南六路的财富运到首都来的。因为在宋朝，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可是它的政治中心还在北方，所以就依靠运河源源不断地把江南财富运到北方来，赡养政治中心，同

时也维护边境的安全。所以薛奎其实就是去运财和敛财的。王旦是宰相，薛奎去辞别他的时候，王旦告诉他“东南民力竭矣”，意为东南的百姓能够贡献国家的能力已经到达了顶点。

为什么薛奎退下来说“真宰相之言也”呢？中国传统的政书中从来没有正面定义过宰相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宰相的职责就是挟天子而理大政，宰相是要负责协和阴阳的。什么叫协和阴阳？协和阴阳是沟通天地的关系，是让天地之间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天人关系要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而天人关系和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调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国家当然需要收税，以此维护国家的运转，保护国家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必须要有一个度。所以王旦提醒薛奎“东南民力竭矣”，薛奎作为江淮发运使会认为这是“真宰相之言也”。

在《王旦传》还有一段张士逊做江西转运使的记叙。他与薛奎的职责其实差不多，主要负责的也是收敛。张士逊辞旦求教时，王旦跟他说“朝廷权利至矣”，即朝廷的专卖收入已经可以了，于是张士逊“迭更是职，思旦之言，未尝求利”，从来没有额外地追求朝廷国家的利润，也没有追求他个人的利益。

如果他多收，那会取得朝廷的好感，但张士逊没有做，社会评价“此运使识大体”。什么叫“大体”？“大体”就是江山社稷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大体”就是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维持一个平衡，因此要“以不扰为善政”，这就是儒家政治。

以上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看“遇人”。这群士大夫，他们能够忧民之忧，不媚上，不从俗，是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是真正睁开眼睛看的。他们有工具性的一面，但他们本人不是工具。工具是不允许思考的，但他们是思考的，他们是积极的，他们是因地制宜的，他们是实事求是的。

范仲淹有一句名言：“为官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公罪和私罪的区分是什么？私罪就是谋私引发的错误和罪过。公罪就是在公家职责范围之内犯

了错误或罪。“私罪不可有”，就是不要谋私。“公罪不可无”就是不要懒政，要做事，做事就有可能犯错误，做事就有可能要承担责任，有可能会得罪人，也有可能得罪上级。但范仲淹说做官的人“公罪不可无”，意味着不能尸位素餐，什么都不做。

那范仲淹自己是怎么做的？《宋史·范仲淹传》中记载：“范文正领浙西时大饥，公设法赈救，仍纵民竞渡，太守日出晏湖上，居民空巷出游，又遇诸佛寺兴土木，又兴敖仓立舍，日役千夫”。

范仲淹在杭州的时候，赶上了饥荒年份，他就进行救灾。他救灾的方式跟传统的救灾方式很不一样，他“纵民竞渡”，他让老百姓去赛龙舟，大搞娱乐活动。而他本人作为太守“日出晏湖上”，坐在画船里，有音乐，有歌舞。“居民空巷出游”，也就是大兴旅游业。而且他还号召那些佛寺大兴土木，同时官府翻新仓库等公共建筑，以至“日役千夫”。

我们今天的人会很好理解，范仲淹做的事情是一个因地制宜的救灾活动。因为杭州这个地方富庶，民间和寺庙都积累了财富，所以要大兴旅游业，大兴土木，创造就业机会，让那些饥民能够靠自己的劳动挣得温饱。这是范仲淹的救灾之方，跟传统开设粥场的救灾就很不一样。

范仲淹这种与众不同的“以工代赈”的做法遭到了他的上级监司的弹劾。范仲淹就向朝廷申辩，说他“宴游兴造，以发有余之财，为贫者贸易饮食，荒政之失，莫此为大”。杭州是个富裕的地方，所以可以让居民通过劳动来解决温饱。最后救灾的效果是“遂惟杭州宴然，民不流徙”，这一年，只有杭州这个地方是安然的，杭州的百姓没有出现流离的情况。

从范仲淹在杭州救灾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事求是，他的不从流俗。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各级部门的负责任，范仲淹这样做了，他的监司不能够理解他的做法，所以弹劾他。但是范仲淹的解释又是有效的，我们没有看到他因此受到处分。他的解释有效说明什么？说明在朝廷之中，上面的人也是能思考的，

他们能理解这件事情，不要求救灾一定要一刀切。他们允许因地制宜，所以最终这个救灾是非常有效的。

北宋前中期，士大夫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忧国忧民的品质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我们再举一个王安石的例子。

王安石曾任度支副使，写下《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其中提到：“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崇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守成法，吝出入，以备有司之事而已”。

三司相当于今天我们说的财政部，三司的副使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财政部级别在这儿，但同时它属于“有司”。“有司”是“有所司”，“有所司”同时也意味着“有所不司”。宋朝人说的“有司”就是有关部门，它是有具体执掌的，这也意味着它执掌之外的是不归它执掌的。

但王安石说三思副使是大吏，是受到朝廷尊崇的。这个尊崇并不只是体现在他工资高、待遇好，而是体现在“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如果这个国家的财政措施有不好的地方，三思副使是可以“议于上而改为之”的，是可以跟上边的人去讨论，然后提出修改的。

按照王安石的说法，“非特守成法，吝出入，以备有司之事而已”，三司副使绝不只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人，他是可以独立思考，是可以对这个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而且他的意见和建议是会受到朝廷的尊重和重视的。这就是北宋，且这就是北宋的士大夫，北宋的华夏群星们呈现出来的状态。

我再举一个救灾的例子，是苏轼给富弼写的《富郑公神道碑铭》中富弼在青州救饥的例子。富弼是和范仲淹一起领导了庆历新政的人，新政破产之后，范仲淹、富弼先后离开了首都。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其实他是在邓州，而富弼后来到了山东的青州。富弼在青州时，兼任青州的经略安抚使，所以他除了青州一州之外，临近的十来个州也是他统管。

富弼在青州赶上河北的黄河大决口，河北的饥民大量地涌入山东。弼采取了

非常强有力的赈灾措施，文中写道“凡活五十余万人”，也就是说富弼的赈灾措施救活了 50 余万河北居民。

那富弼是怎么救灾的？苏轼的记载虽然很简单，但是非常明确。富弼的赈灾措施包括：第一点，“公择所部丰稔者五州，劝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廩，随所在贮之”。首先他先查搜集余粮，他在管辖下的五个大丰收州中“劝民出粟”，这个“民”实际上是富民。

我们要转变我们对于富民、商人以及富裕阶级的传统认知，而宋代的认知在中国传统当中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认知。那些不管是靠自己致富，还是靠祖先遗留下来的财富致富，只要这个“富”是合理合法的，都会得到国家承认。而且国家相信民间财富的积累对于国家来讲是有积极正面的作用的。

比如说富弼在青州救饥的时候，他“劝民出粟”，那一定是富民出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主，可能也还包括富裕的商人。富弼劝他们拿出余粮，再加上官府中官仓里的余粮，得到了 15 万斛，然后“随所在贮之”。“随所在贮之”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集中储存，而是分散储存。这是富弼做的第一点，调查余粮的状况，然后分散储存。

第二点，调查能够使用的住房情况。“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他找到了十余万个可以住的地方。饥民是大规模来的，不是一千、两千，而是十几万、二十几万，甚至到会到达五十余万，要给他们找到住的地方，然后分散居住。为什么分散居住？因为要“以便薪水”，烧柴、用水，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集中起来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置。富弼就是把粮食、住房都分散了。

这么大规模的居民，其实是要管理的。管理不是谁都行的，要当过官的人才有这个能力，要有管理经验的人。富弼接下来又调查了官员的情况，“官吏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廩之”。这是第三点，富弼对管理人才的调查，并把这些人员动员起来，管理难民。

第四点，“山林河伯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

这也是政府、朝廷，也包括今天的政府，在一些危急时刻的政策，是可以征用私人的财产的。

第五点，对于这些被征用的官吏“皆书具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糗饭劳之，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对于动员出来的官吏不白用，这考虑到了人性。在危急时刻，凭着道义，人们是愿意出来工作的，但是他们也应当被铭记，被感谢，被赏赐。所以富弼对动员出来的官员们都说，会记住他们，会写下他们的功劳，并且有一天会向朝廷去申请来赏赐他们，每五天还派人去慰问他们，所以“人人为尽力”。

富弼还有一个做法——“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对于那些不幸死在当地的流民，富弼还安葬并且祭奠他们。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传统，非常重视死亡，给死者以尊严。

富弼的“青州救饥”是中国赈灾史上，我想也是人类赈灾史上一次无以伦比的壮举。而他之所以能够实现“凡活 50 万余人”，是因为他的这些做法切实有效。他进行了粮食、住房、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的调查，然后妥善安置。而且他有一套制度，能够让那些动员出来的官员都能够尽力，同时他还有人文关怀。我觉得在“青州救饥”这个问题上，富弼绝对是一个英雄。他多么地能办事，而这个能办事出自他的儒学修养，出自他不断学习的精神，也出自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始终是在睁着眼睛看的，他如果是只听上级的话，他是办不成这样的事的。

以上就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有这样的政策，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大忠之义。那么这个最好成绩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最好成绩背后的皇帝因素和政治传统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说到皇帝因素的话，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开国皇帝宋太祖。按照南宋学者李涛在长篇里边的记载来看，太祖开国确实是陈桥兵变上台的，但是这支兵变军队回城跟五代时期的兵变军队回城是很不一样的。五代的军队回城，是进城之后先要纵容军队烧杀抢掠的，把首都、首都的人民、首都人民手中的财富作为战利

品，奖励拥戴皇帝的军人，这是五代的做法。

但是到了宋朝开国的时候，宋太祖赵匡胤是在进城之前，就已经和军队约法三章，不允许扰乱开封秩序，允诺会开仓库赏军队。约法三章后，这支军队是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犯，它开创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宋朝没有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最核心的原因就在于此。宋朝开国一代的政治家，已经很清醒地认识到“兴亡易代，虽曰天命实系人心”，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这个人心既包括最广大的老百姓的心，也包括官僚集团的心。所以宋朝的政治传统当中，有一个传说是“太祖誓碑”，是说太祖留下来的政治遗嘱当中包括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大臣就是到了一定级别，如宰相级别的官员是不能杀的。还有一个就是批评的官员——言事官是不能杀的。其实“太祖誓碑”的说法出来的很晚，而且是否有“太祖誓碑”的物质实体，我本人认为是不要紧的。


“最好成绩”背后的皇帝因素与政治传统

宽容：“太祖誓碑”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

多元：“异论相搅”

陈寅恪《论再生缘》：“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

“祖宗法惠民”：“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



赵匡胤 (927 - 976)

范仲淹曾提到过本朝有不杀的传统，后来程颐和程颢其实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就是本朝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事实上，到了范仲淹这个代际，就已经很清醒地总结出来本朝的一个政治传统——即便是没有“太祖誓碑”的物质实体，甚至即便它是不存在的，但是不杀大臣、不杀言官的宽容政治传统，确确实实是事实。

宋朝所奉行的是一个相对多元的政治，在朝堂之上允许有不同的政治意见和政治派别存在。理想的朝堂是皇帝高高在上，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互相竞

争，互相斗争，在经过竞争和斗争之后，皇帝择善而从，最终选择最符合朝廷、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决策。祖宗的法度是惠民的，“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即朝廷与国家的政策制定的核心目标，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要“安利元元”，要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在朝廷、国家和天下苍生之间要保持一个平衡，要“不夺农时”。

为什么能够形成这种状态？再这样的政治传统之下，整个思想界的状况是什么呢？这里我引用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提到过的“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宋朝是一个思想极其自由的时代。

陈先生其实是在谈骈体文的写作的时候提出这句话的。骈体文的写作需要在高度格式化，高度讲究形式的文体当中达意，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陈先生说必须要思想极其自由，才能够写出这种好文章来。陈先生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写得好的原因就在于思想自由。

我在陈先生的基础之上做一个推进，我认为六朝的自由跟天水一朝的自由其实还不太一样。六朝的自由其实是一个破坏的自由。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儒家经学已经陷入了僵化，无法应对社会的变革，所以六朝的自由是一个打破的自由。

而天水一朝，特别是北宋，他们的自由是一个建设的自由。从东汉末年开始，历经了漫长的一千年之后，儒家思想在新的基础之上进行新生和再造，所以宋朝的自由是一个建设的自由。

但是这种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事实上是未能长久的。这个未能长久与改革有关。批评时政、改革积弊是“大忠”的必然追求。南宋的朱熹曾经说王安石变法，他提到：“只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变法是“大忠”之臣的必然要求。真正的士大夫一定是秉承着儒家的理念，睁开眼睛看宋朝的现实。现实是瞬息万变的，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新问题出现，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要应对这些变化，就必须变革。

改革的呼声其实在宋朝其实一直都是有的。阅读宋代史料，我们会发现，宋

代的批评时政的言论是最多也是最严厉的。范仲淹曾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变革是“大忠”的必然追求，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宋朝政治的转向也是在变革之中发生的。北宋大的变革其实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043-1044年间的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特点是什么？它是一次方向正确的失败改革。改革最终是失败了，但是它的方向是正确的。

张帆老师在《中国古代简史》中总结范仲淹改革方案分为“十事”，前五事都是有关于吏治的，他具体的改革思路是“欲强国，先富民，欲富民，先澄清吏治，澄清吏治则先裁冗滥，继任贤才”。所以庆历新政首先是向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开刀的，因此他也得罪了大多数权贵，所以最终遭遇了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急躁冒进，走得太快；二是未能团结大多数；三是改革派的作风也导致他们遭遇了敌人的朋党指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当时宋朝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皇帝的敦促之下，庆历新政的改革才开始。等到改革进行之后，实际形势也好转了，宋夏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国内的叛乱也逐渐安定下来了，所以仁宗放松下来了，加之改革派遭遇了朋党的指控，故他不再信任改革派。

改革派从中得到的教训有这几点：一是皇帝的信任才是第一位的，如果皇帝不信任，改革将很难进行；二是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的改革不能进行的太快，这是“深水区”的改革，必须要温和渐进；三是因为温和渐进，所以要追求和解；四是要存大体，体貌大臣，要保持高层内部的团结。这就是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本身是成功的，但是其导致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为什么说变法是成功的？我们判断一个事情是否成功，主要看他是否达成了目标。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理财，他达成了理财的目标，以“富国”

支持神宗主导的“强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安石变法是绝对成功了。

第二点，我们判断王安石变法是否成功，不应该是以王安石是否下台为判断标准，而是要看王安石的线路是否能延续。从这一层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宋神宗是王安石最好的学生，他更加纵深地推进了王安石路线，继承和发扬了王安石路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不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

王安石变法中，很多措施都具有现代色彩，内里存有非常先进的、理性的因素。它表现于宋朝行政水准是远超前来的金元明清的。在此意义上，王安石变法是都有其可取之处的，而且王安石变法也没有给宋朝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然在此，我的重点是阐述王安石变法对于北宋政治的影响。简单地说，王安石变法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也就是说北宋前期那种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因为王安石变法逐渐地陷于消亡。接下来，我从做法、说法、施政方式和官僚风气等几方面简单地与大家分享。

首先是做法，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利用雕板印刷术来打击政敌的人。老臣韩琦对青苗法提出了批评的意见，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之下，组织人逐条批驳完后，再经过他自己润色过之后，雕版印刷发放全国。可以认为这种做法是统一思想，但是韩琦的原文并没有被雕版印刷，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称的战争。

另外，曾经受到王安石推荐的李常，他秉持谏官以批评为核心理念，也对青苗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王安石的助手吕惠卿就去威胁李常“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后来李常也确实遭到了处分。

王安石在做法上已经出现了对异己的排斥和打击。同时伴随着一些重要的部门，例如喉舌部门已经开始用上自己更得意的人——支持新法的人。这就是王安石的做法，已经和前期不太一样了。

第二个是说法，即发生了思想转向，王安石倡导迎合帝意或上意。曾有一人名叫王广渊，他在山东地区推行变法时被状告到朝廷，王安石为其辩护时说：“广

渊为人，诚不可知，然见陛下欲责功实，乃能趋附，以向圣意所在。”意思就是，王广渊是怎样的人，王安石也不知道，但是他能积极迎合皇帝和中央，这便是好的。

王安石还引用了《周礼》中的言论来辩护，他说：“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这个“其”指代的就是王广渊。王安石说上古时期曾设置专门的官员去告诉老百姓，主上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让老百姓避开主上不喜欢的。

实际上，王安石引用的是《周礼·秋官·掌交》中的“掌交，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王安石将其解释为“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所以不应当“罪迎合”。如果上意是对的，迎合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上意是不对的，仍然迎合的话必然会产生问题。如果整个官僚集团按照这种思想进行建设的话，那这官僚集团就没法要了，它无法匡正皇帝的错误。王安石的解释其实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解释，而在传统儒家中，是有更好的解释的。

《礼记·淄衣篇》中提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意思就是，治理百姓的人要把什么是对的告诉百姓，引导百姓做对的事情，同时还要告诉百姓什么是不对的，防止老百姓走上歪路，这样百姓们才不会疑惑。

《孝经·三才章》还有更简短的解释：“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就是要告诉老百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样老百姓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才是对于《掌交》的更符合道德的解释。以王安石的博学，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但是王安石却采取了“恐不当罪其迎合”的解释方式，并且引用儒家经典来做解释，这样的危害性是极大的。

在王安石变法时期，一种新的施政方式开始出现，这种施政方式叫“国是政治”。其特点是皇帝与他所信任的宰执，而不是士大夫群体“共定国是”。“国

是”一旦确定之后，就是唯一一个“正确”的方针政策，但它又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方针政策，它通常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路线方针和用人原则。比如说青苗法、免役法，所有王安石的做法都在“国是”这个大礼包之内。“国是”一旦确定，就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和排他性。“国是”是不容讨论和议论的，因此那些不同的意见就必须打击。“国是”对于议论的打击，就构成为政治压迫的主要动力。

“国是”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我们说“仁政爱民”，这是放之四海，万事皆准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要说青苗法一定是对的，这就有问题了。

“国是”的极端形态就是南宋的权相政治。它的特点是什么？是“君权独运，权相密赞，其他所有的大臣，竟不知底蕴，一般士大夫，更不能闻问”。这就是专制，要么是皇帝的专制，要么是皇帝和皇帝所信任的宰相的专制。其他的宰相和士大夫集团不允许提意见，事实上也就会慢慢地放弃思考，由此带来的是“士风”的变化，官僚的工具性增强。

神宗真正用的久宰相并非王安石，而是一个叫王珪的宰相。此人无所见成，外号叫“三旨宰相”。他从来不拿主意，别人有事找他，他就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回去后又跟找他请示的那个人说：“已得圣旨”。这就是神宗真正用得顺手的人。

在王安石时代，神宗还处在执政的学习期，所以王安石可以说了算。神宗有时候会动摇，会掣肘，但基本上也跟着王安石走了。但到了王安石下台之后，神宗真正当政，宰相就已经变成了秘书。这种宰相的好处是高效，但真要靠他拿主意，他是没主意的。不允许他思考，时间长了他就不思考，也不会思考了。不思考和不会思考，都是很麻烦的事情。这是官僚工具性的增强。

我再举一个例子——理财第一能臣吴居厚。吴居厚在京东（今山东）做了将近五年的京东转运使。元丰六年时，神宗有一个批示夸他说“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相当于神宗为他写了一个匾，即“理财第一能臣吴居厚”。

神宗认为吴居厚在京东的理财是“不辱使指，无黷乎上，不扰乎下，不諠于

闻”，意思是吴居厚没有辜负上级的信任，没有惊扰到老百姓，也没有造成很大的困扰。“前日县官窘迫，一朝变为宽纾。经费之外，又能应缓急之求”，所以神宗夸他“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

但是“京东之人，恨不能食其肉”，而且“京东盗贼”亦想“取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为什么京东之人那么恨他？因为吴居厚是一个“掊克吏”，他特别能搜刮。为什么盗贼要把这个“掊克吏”投到炼铁炉子里边？因为吴居厚的理财措施当中有一项——老百姓必须买他造的锅。四口买一，五口买二，但谁家要那么多锅，传统社会里一口锅不用到烂是不会换的。所以吴居厚就遭京东之人恨。

王安石变法阵营的曾布曾反对吴居厚任户部尚书，他提到：“非取之于民，何所从出？前日之京东，今日之京东，与居厚在彼时，宜无以异，不知居厚和术独能致此羨余？”意思就是说，吴居厚上任之前的“京东”，跟现在的“京东”，还有吴居厚当政时的“京东”是一样的，但吴居厚的前任跟吴居厚的后任连政府规定的额度都收不上来，而吴居厚在规定额度之上还能多收。这就是“理财第一能臣吴居厚”，他的工具性是极强的。

像这样工具性极强的官员，他们确实能够做到“不辱使指，无黷乎上”，但他们真的能做到“不扰乎下，不諠于闻”吗？恐怕在他们眼里，民怎么样已经是不重要了。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整体变化，官僚士大夫的风气已经发生了变化。

《宋史·孙傅传》中，孙傅曾说：“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大意为王安石变法之前的法度是对百姓有好处的，它协调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为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而服务的。到了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和神宗当政期间的法度是对政府有好处的，王安石主导的“理财”支持了神宗的“拓边”活动。到了崇观年间，熙丰法走向了一个极端。崇宁、大观是徽宗的年号。崇观年间的法度是只对奸臣有好处。

崇观法是熙丰法的一个极端，熙丰法其实就隐含了走向崇观法的一些苗头，比如说它不再允许批评了，比如说王安石对于“迎合”的合理化解释。失去了约束的皇帝和失去了大忠之义的宰相大臣，最终都会走向崇观法的惠奸。

当我们回顾的时候，可以发现，在王安石变法之前曾经出现且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而王安石变法在“理财”“富国强兵”的大背景之下，为了追求效率，其实就牺牲了之前政治上的一些好的做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就逐渐走向下坡。在南宋金元以后，又和来自北方野蛮民族的落后思想结合在一起，一直延续至明清，造成了中国人进入近代时期的政治文化样貌。在此意义上来讲，我高度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即“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我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校长内参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明德云学堂

大咖零距离 尽在明德云